

被蹂躪 被歧視 被遺忘

慰安婦 老無所依 拾荒維生



曾經被日軍抓作「慰安婦」的李金魚在侵華日軍南京大屠殺遇難同胞紀念館講述當年日軍暴行，不禁悲從中來。資料圖片

日右翼妄言惹公憤 受害人誓抗爭到底



李秀梅15歲時被日軍抓走充當慰安婦，因反抗遭毒打，致使右眼失明。

日本大阪市長橋下徹早前妄言，「慰安婦」制度是當時保持軍紀所必須，並稱沒有證據顯示，日本政府和軍方直接採取了綁架、脅迫「慰安婦」的行為。此言一出，舉世嘩然。山西倖存慰安婦代表李秀梅、陳林桃、郭喜翠憤而對日提出抗議，並通過律師將抗議書郵寄至日本各方，聲言「只要尚存一口氣」，就要對日討還公道。

中國慰安婦倖存者中第一個站出來控訴日軍暴行的萬愛花，60歲開始就向日本政府討要說法，直到今天一直在繼續努力。自14歲起，萬愛花三次被抓走遭到性暴力侵害，全身多處骨折，非人的摧殘使她整個身體嚴重變形，1.65米的身高縮至1.47米，在床上躺了三年後才頑強地活了下來，卻在餘生飽受後遺症折磨。另一位赴大阪控訴日本的楊大娘，當地講到7歲就被3個日本兵強暴，從此再也沒有離開尿布。李秀梅當年15歲因反抗日軍侮辱遭到毒打，致使右眼失明。

日本大阪市長橋下徹早前發表「慰安婦必須論」，有日本政客在該問題上含糊其詞，這一切均激起國際義憤，公眾目光再次聚焦這群不幸的婦女身上。長期從事慰安婦問題研究的上海師範大學教授蘇智良調查證實，二戰期間全中國先後有20萬婦女被迫充當慰安婦，仍在世的僅餘20餘人。她們戰時被蹂躪，戰後被歧視，漸漸被遺忘，如今被日右翼合理化，維權苦無果，落得老無所依，窮得靠拾荒維生，吃餵豬菜度日。蘇智良呼籲政府將慰安婦納入社保體系，讓這群半生飽受煎熬的婦女安度餘生。

蘇智良的電腦中，小心翼翼地保存着一份長長的名單。這份名單上字體的顏色紅黑相間。黑色字體，代表這個人仍然在世。被紅色圈住的，則表示已經撒手人寰。記者指尖觸及冰冷的電腦屏幕，細細數去，仍然顯示為黑色的名字，僅餘26位。

蘇智良說，這裡的每一個名字，對應着的都是一個血淚交織慘不忍睹的故事。因為，她們有一個共同的代名詞：慰安婦。

倖存者血淚證言 三分之一無法生育

57歲的蘇智良，除了大學教授之外，還有一個職務：中國慰安婦問題研究中心主任。21年前，他開始着手在全國範圍內調查中國慰安婦。他登記在冊的名單上，仍然存活於世的人，最多的時候有100多個。踏遍全國，蘇智良收穫的是滿目瘡痍。他家中存放的40多盤受害者口述的磁帶，盤盤血淚交加，令人不忍卒聽。每一個故事，都是一幕慘劇。過去、現在，命運交織，悲劇尚未收尾。蘇智良說，這100多名婦女中，多達三分之一無法生育，有人因此被丈夫拋棄。即便倖存者，有朝一日真相曝光，亦難逃夫家頓頓辱罵毒打。待到含辛茹苦將子女養成人，還要遭受後輩的冷嘲熱諷。於是更多的人，選擇孑然一身，最終老無所依。

昏倒路邊沒人理 恥辱標籤伴餘生

這些八、九十歲的老人，家徒四壁，晚景淒慘，許多都要靠拾荒維生。蘇智良回憶，一次他揭開老太太的鍋蓋，發現裡面全是野菜，便隨口問了句是餵豬的嗎？老人家幽幽地說，「第一碗給自己吃，剩下的才給豬吃。」除了當地低保，孤苦的老人們幾乎沒有任何經濟來源，亦從未得到政府援助。飽受凌辱的過去，難以得到世人的同情，更成為恥辱的標籤。

辱的標籤。很多年前慰安婦問題剛剛受到關注時，曾有四位老太太特意從山裡跑出來，找到當地縣政府，想告知自己就是當年慰安婦制度的受害者，居然得到了這樣的回應，「你們做了這樣的事情還好意思說，回去吧！」結果這四個老太太流着淚離開了。

蘇智良說，還有一位山西老太太侯冬娥，因年輕時淪為慰安婦一直遭全村人嫌棄，昏倒在路邊幾個小時，都沒有一位村民願意扶她一把。1994年，侯冬娥悄悄無聲息地在破爛矮小的窯洞裡逝去，她的一生僅在報紙上留下一些片段：「她是村子裡最受輕視的女人，大家不叫她真名，稱她是『進過炮樓的。』」

怕歧視自我否定 選擇沉默地遺忘

由於懼怕世俗的眼光，更多的受害者選擇了沉默，或是在餘生盡力努力遺忘。在蘇智良的採訪經歷中，曾不止一次被老人家喝斥「胡說八道」，甚至還曾被動用「武力」掃地出門，「有一位老太太，起先對着我們堅決否認，末了她附在我耳邊，悄悄說了一句：『有些事已經過去很多年，就讓它爛在心裡吧！』」



蘇智良與妻子陳麗菲到江蘇省如皋探望倖存者周粉英老人(圖中)。他常常自掏腰包，憑一己之力資助她們。

學者籲建保障制度

2005年，96歲的朱巧妹在孤苦中辭世。她是上海最後一名中國籍慰安婦。1938年，朱巧妹與婆婆、姨婆和遠房姐姐一起被日軍編為「慰安組」，在家中或炮樓向日軍官兵提供「服務」，每周五次以上，直至1939年底，噩夢才劃上句號。但彼時的朱巧妹已百病纏身，婦科病、腎病，終身未癒。

民間捐款杯水車薪

朱巧妹一生貧病交加，是諸多慰安婦倖存者的真實寫照。當年被日軍暴行摧殘的妙齡女子，如今大多年事已高，生活狀況堪憂。許多人拾荒為生，窮困潦倒。由於官方援助的匱乏，中國慰安婦問題研究中心主任蘇智良常常自掏腰包，憑一己之力資助她們，或幫忙籌集社會捐款，但也是捉襟見肘、杯水車薪。

專家籲建專項基金

2000年，有一個「亞洲女性國民基金」找到蘇智良，表示願意援助老人。但接觸後，蘇智良發現，這個組織實際由日本政府和民間募捐共同出資，「目的是給了錢，就要我和受害的老人們閉嘴。」蘇智良當然沒有接受。據透露，紅十字基金會一度曾表示捐款資助，最終卻因慰安婦問題過於敏感而擱淺。

在中國內地，戰爭倖存者目前仍是政策性救助的空白點。慰安婦、細菌戰受害者、被強擄勞工、南京大屠殺倖存者等戰爭受害特殊人群，目前生活資助絕大多數來自民間的零散資助。多年來，不斷有專家呼籲各地應儘快建立專項基金會，將這些老人納入社會保障體系。

蘇智良痛心地說，中國慰安婦問題研究中心從2000年開始對倖存者進行自主性捐助，標準為每人每年4000元。但是依靠社會募捐的力量仍然十分薄弱，他建議，政府部門對慰安婦、大屠殺倖存者的援助制度化，讓這一批民族歷史血淚的見證者，有略為舒適的晚年。

滬百餘慰安所成人間地獄

中國慰安婦問題研究中心主任蘇智良的研究發現，上海是日軍實行「慰安婦」制度的發源地。為了給數以千計的海軍陸戰隊官兵提供「衛生」的高性服務，早在1931年，日本駐上海海軍當局就已將虹口一帶的「大一沙龍」、「小松亭」、「三好館」、「永樂館」等，指定為海軍特別「慰安所」，一度至少超過164間。在此後的10多年，共有20萬中國婦女被迫充當慰安婦。

10年20萬華婦受辱

東寶興路125弄的「大一沙龍」是日本海軍制定開設的慰安所之一。從1931年至1945年，它既是日軍在海外設立的第一個慰安所，也是世界上存在時間最長的日軍慰安所。舊址如今是上海的普通民居。2號樓的吳家，一間臥室的房門還保留日式推拉門，牆上也仍保存着慰安所時代的木雕。據吳家人回憶，當年剛住進來時，房間裡還鋪着日式榻榻米。

原址建紀念館未果

蘇智良想在「大一沙龍」原址興建一所慰安婦紀念館，卻始終未能如願。據估算，僅動遷居民就需花費2億元資金，中國慰安婦問題研究中心實在承受不起。不過，由蘇智良發起的「中國慰安婦資料館」2007年已在上海師範大學開館，這是繼韓國首爾和日本東京後成立的世界第三家慰安婦資料館，陳列了80餘種慰安婦研究資料，其中包括見證日軍慰安婦制度實施的物證（如受害者從慰安所帶出的消毒藥品、戰時日軍避孕套、日本老兵照片等）以及各地慰安婦的口述記錄及她們在



滬江灣慰安所大門口的對聯。



世界上第一個慰安所「大一沙龍」現在是上海的民宅。慰安所使用過的生活用品等。而內地首座在日軍慰安所原址上建設的展覽館於2010年在雲南省龍陵縣「董家溝日軍慰安所」開放。

冷暴力「殺死」慰安婦

然而，慰安婦畢竟是日本暴行的「活證據」，於是，這世界也會偶爾「關注」這位倖存者——在中日關係陷於僵局時，在任一個抗戰紀念日需要以史為鏡時，或在她們中的某一個撒手人寰致證據清單縮短時……

慰安婦，儼然只是抗戰史的一部分。她們還活着，卻已經「作古」。她們的故事，止步於幾十年前，僥倖獲得的餘生，卻無異於苟活。

更可怕的是，一個民族曾經的屈辱史，最終居然轉變為一把把枷鎖，將受害者銜在道德審判席上。被關押、被強暴、被虐待，至被取笑、被厭惡、被拋棄，以為時過境遷，孰知只是從暴力到冷暴力而已。她們的一生，原來自始至終都活在敵人或同胞的暴力之中，噩夢又怎能醒過來？



倖存「慰安婦」餘生飽受後遺症折磨。圖為躺在病榻上的中國「日軍性暴力受害者」對日訴訟第一人萬愛花。網上圖片